文档格式可参考如下：A4页面，宋体小四号字体，1.5倍行距。

《社会学的想象 》的最后两章延续了米尔斯对历史的讨论，同时也进入了对政治的分析。第 9 章“论理性与历史”首先询问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期。米尔斯认为，我们经历了历史上的三个主要时期：古代、黑暗时代和现代。但根据米尔斯的说法，现代性现在即将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未知的第四纪元。我们为什么要离开现代性？米尔斯说，答案是因为我们正在离开一个我们相信理性的时期。

根据米尔斯的说法，产生现代性的启蒙运动以这种信念为前提：更多的理性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如果人类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学会更有逻辑地思考，那么人类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公正。这种想法有两个方面。一种是自由主义，米尔斯将其与 19 世纪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联系在一起，后者提倡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另一个是社会主义，与另一位 19 世纪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有关，他提倡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米尔斯认为，看待现代性崩溃的一种方式是，看看这两位思想家都无法理解当今社会。西方的资本主义会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感到震惊，就像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分析过苏联的共产主义集团一样。

最重要的是，更多的理性就是更多的自由这一基本前提已经被之前讨论的官僚主义的兴起所驳斥。官僚主义就是更多的理由。它试图使一切合理化，使企业和人们更有效率。但其效果实际上是失去了自由。人们被这种合理化所剥削，而不是被解放。反过来，理性已经成为暴政的工具，而不是自由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男人因为适应官僚主义而失去了改造世界的能力。他们参与合理化，而不是学习如何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米尔斯称之为“没有理由的理性”。它导致个性的丧失。最后，它导致了米尔斯挑衅性地称之为“快乐机器人”的兴起。在现代，我们有“文艺复兴人”，他们创造了自己并创造了历史。

米尔斯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提出了快乐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就个人而言，“麻烦”是疏远：在如此机械地工作中，人们与他们真正的自我意识疏远了。在社会上，公共“问题”是民主社会的丧失。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参与影响他们的决策。在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是由管理精英来做决定。因此，历史也面临双重威胁。首先，普通人可能会停止创造历史，而是“随波逐流”或随波逐流，不改变世界。其次，精英人物可能会创造历史，但历史是不公正的。

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的最后一章“论政治”中谈到的正是这种双重威胁。在这里，米尔斯询问社会科学家可以做些什么来创造历史并阻止人类自由的衰落。根据米尔斯的说法，社会科学始终具有三个总体理想：真理、理性和自由。它现在必须使用真理来重新确立理性与自由之间的联系。社会科学家必须成为让理性为自由服务而不是为官僚主义服务的领导者。

他首先指出了社会科学家可以活跃于政治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作为“哲学王”，社会科学家是社会的权威；米尔斯认为这已经成为过去。二是作为“国王的顾问”，社会科学家是权威的顾问；米尔斯说，这就是社会学对官僚主义的忠诚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社会科学家现在必须选择第三条道路：独立的道路。社会科学家应该是社会和权威的独立评论员。这并不意味着处于社会“外部”。事实上，脱离社会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社会中。但社会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他们的环境”的能力。换句话说，社会学家，通过观察和理论，可以看出他们的私人生活是如何成为更大模式和结构的一部分的。然后，社会学家需要与他人分享这种看待和认识的方式。

社会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针对公众的不同部分，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对于那些当权者和故意支配他人的人，社会科学家应该将结构性问题归咎于责任。当当权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产生后果时，社会科学家应该教育他们并让他们对未来负责。对于那些没有权力的人，社会科学家应该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麻烦也是公共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将个人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进行公开辩论。

由于独立于权威，社会科学家将无法接触到主要的权力途径。但米尔斯表示，他们仍然拥有“脆弱的权力手段”。作为教授，他们指导学生，有时指导公众。他们可以投资于“自由教育”，即解放的教育。社会科学家不应该传授技能（如如何钓鱼）或价值观（如慈善或美德），而应该传授米尔斯所说的“敏感性”，这是一种涉及技能和价值的自我意识。它是批判性思维和辩论的技巧，是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所在。

对于米尔斯来说，最终目标是民主，他将民主定义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影响他们的决策中发表意见。目前，教授们还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教育机构，让大学更加民主而不是官僚主义。米尔斯在他的书的结尾呼吁社会科学家抵制他们大学的官僚化，而是鼓励争论和辩论以激发公众对话。这就是如何在未来重新调整理性和自由。

## 分析/个人理解

《社会学的想象》的最后几章将前几章的争论推向高潮。正如米尔斯批评当代社会学为统治系统服务一样，现在他展示了古典社会科学如何为解放系统服务。正如社会科学如果实践不当会产生官僚主义一样，社会科学如果实践得当也会产生民主。这些是米尔斯的高风险。这不仅仅是做奖学金好坏的问题。这是创造一个好世界或坏世界的问题。

米尔斯在这些最后几节中用他的语言暗示了他所要求的东西的无限性。有时，米尔斯似乎停滞不前。他离题了。他说他会在稍后给出建议。他曾写道，“这些都是非常宏大的目标，我必须以一种稍微间接的方式来解释它们。” 对于写过明确抨击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更不用说抱怨像塔尔科特·帕森斯这样的宏大理论家了间接和含糊地写，在本书的最后几段中看到这种间接引语的承认是很奇怪的。但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开口。米尔斯在最后几章的写作更具哲学色彩，因为他写的是民主等宏伟理想；因为他想培养辩论，他让自己更容易接受不同意见和质疑。

米尔斯试图打开局面以进行更广泛的讨论，这一点在他转向“我们”时也很明显。在整个《社会学想象力》中，米尔斯都写成“我”，但在这里他开始谈论自己是一群更大的社会科学家中的一员。必须继承经典社会科学，实现民主理想的是“我们”。他正试图弥合他在社会科学领域也造成的分歧。现在是齐心协力实现社会学想象的“承诺”的时候了。

在《社会学想象力》的附录中，米尔斯进一步转向：从“我们”到“你”。在附录中，他向刚刚接触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致辞。他对他的学者的主要建议是写日记。社会学家生活在他们研究的社会中；因此，记录你的生活也可以导致对社会的洞察力。米尔斯呼吁学者们将他们的生活融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并以他们的工作为契机来反思他们的生活。Kirin Narayanan 称之为“生活经验和智力工作之间的创造性运动”(89)。社会学家没有工作/生活的划分。这就是为什么米尔斯最终称社会学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手艺”。这是一种人们像陶艺一样练习的手艺。你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勤奋，就会产生一些东西。

Thomas Kemple 和 Renisa Mawani 将这种转向“工艺”称为“祈祷”。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的结尾处祈祷，而不是他自称一种职业。这与他的道德基调非常吻合，他显然也在为民主祈祷。他呼吁回归价值观，就像他呼吁一种特定的社会学方法一样。一方面，米尔斯将社会学定位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的良方，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傲慢自大。但他也有一种真诚的愿望——祈祷——希望他的工作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能够带来他认为世界需要的那种解放和民主。

这一本书的中文版对于留学生来说非常晦涩难懂，所以我选择读英语版本的然后用用英语写笔记再然后翻译成中文。米尔斯的每一个章节都需要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去解读才能知道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甚至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才知道作者其实有讽刺含义在背后。

在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因为米尔斯受益于这一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他将社会科学定义为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不仅是人类，还有多样性。如果做得好，社会学是将社会分解成多个部分，而不是试图解释普遍行为。这是使社会学与众不同的核心，对米尔斯来说，保持这一传统很重要。他写作的时候社会学还是一门新学科。在 1950 年代，没有多少大学设有社会学系。随着社会学家开始确立自己的身份，米尔斯想要坚持多样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应该受限于自己的视角，而是尽量去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看待一件事。